

中 | 华 | 经 | 典 | 名 | 著
全本全注全译丛书

新 书

方向东 译注



中華書局



ISBN 978-7-101-08828-1



9 787101 088281 >

定价：25.00元

中华
经典
名著

全本全注全译丛书

方向东◎译注

新书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书/方向东译注. —北京:中华书局,2012. 10

(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

ISBN 978 - 7 - 101 - 08828 - 1

I. 新… II. 方… III. ①政书 - 中国 - 西汉时代
②《新书》 - 注释③《新书》 - 译文 IV. ①D691.5②234.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69763 号

书 名	新 书
译 注 者	方向东
丛 书 名	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
责任编辑	张彩梅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12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2¼ 字数 250 千字
印 刷	1 - 8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08828 - 1
定 价	25.00 元

前 言

一、贾谊传略

贾谊，洛阳（今河南洛阳）人，生于汉高帝七年（前 200），卒于汉文帝十二年（前 168），汉初著名的大儒。他在为官期间，为西汉王朝的长治久安，提出了许多治国方案，具有远见卓识。在思想方面，他继承了先秦诸子的思想，并加以发展，完成了向汉代中期董仲舒新儒学的过渡。在文学方面，他的散文，对后代散文的发展有很大影响；他的骚体赋，开了汉代散文赋的先河。因此，将贾谊誉为汉初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实不为过。

贾谊出生时，战国时期封建割据局面已经结束，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专制王朝——秦王朝，在全国农民起义的大风暴中崩溃了。大一统的西汉王朝，需要一种加强对人民全面控制的思想体系。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文化毁灭暴行，汉高祖不事诗书、以儒冠为溺器的文盲统治，已不能适应历史前进的潮流。注重休养生息的黄老“无为而治”思想应运而生。这种思想，为社会生产的恢复创造了条件，促使人民生活比较安定，也促使了封建统治秩序渐行巩固。文化上的专制也放松了，“孝惠之世，除挟书之律”。这样的政治背景和文化氛围，为贾谊登上政治舞台开拓了良好的环境。十八岁的贾谊就以诵读儒家诗书和长于属文

闻名于当地,先后受学于李斯的学生吴公及荀况的学生张苍。二十二岁时,已“颇通诸家之书”。在文帝荐举贤良方正的政策下,他经吴公的推荐,被文帝召为博士。博士是备皇帝顾问的官员,他因此有了机会参与朝政。他年少博学多才,许多先生不能回答的问题,他都代为应对。文帝很赏识他的才能,一年内就破格提升为太中大夫,秩比千石。贾谊受到重用,便利用机会提出了许多改革制度、更定法令的建议,“以为汉兴二十余年,天下和洽,宜当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草具其仪法,色上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奏之”。文帝见他年轻有为,曾想把他提到公卿的位置,却遭到权贵保守派绌侯周勃、丞相灌婴、东阳侯张敖、御史大夫冯敬等人的嫉忌、排斥与诽谤,说他“年少初学,专欲擅能,纷乱诸事”。文帝因此疏远了他,不采用他的奏议,派他做长沙王太傅。从秩禄说,由太中大夫的比千石到长沙王太傅的二千石,是升官,实际是明升暗降。一离开朝廷,他就失去了施展自己政治才华的机会,标志着仕途走下坡路。于是过湘水,作《吊屈原赋》以自喻;任长沙傅三年,作《鹏鸟赋》以自广。

文帝没有忘记贾生的才华,又惑于鬼神之事,文帝前元七年(前173),在未央宫的宣室召见贾谊,问鬼神之本。贾谊一一道其所以然,以至夜半,文帝前席,但又不委他重任,只是派他任小儿子梁怀王的大傅。唐代李商隐作《贾生》诗慨叹说:“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文帝用贾谊,是因为重其才;而不重用,固然因为朝廷保守势力的排挤,更与文帝实行“无为而治”的治国指导思想有关。随着汉政权的逐步巩固,新的矛盾和危机开始出现:同姓王的“分封”,潜伏着割据分裂的危机,王国势力凌驾朝廷;“和亲”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匈奴的骚扰,匈奴对汉无尽止地嫚侮侵掠;“轻徭薄赋”、“约法省禁”的政策,使商人豪强日甚一日地兼并农民;“无为而治”已不再适应经济、政治的需要。贾谊看出了这些矛盾和危机,大声疾呼变“无为”为“有为”。这是文帝

与他治国指导思想的根本分歧所在,是他不被重用的根本原因。

梁怀王是文帝宠爱的小儿子,地位比长沙王高得多;国都在中原,离长安不远。比起长沙来,贾谊的处境大为改善了。在任梁怀王太傅期间,贾谊针对当时“匈奴强,侵边;天下初定,制度疏阔;诸侯王僭倨,地过古制”的形势,“数上疏陈政事,多欲有所匡建”。今传《陈政事疏》(或称《治安策》)的大部分,就是这个时期写的。

文帝前元十一年(前169),梁怀王不幸坠马死。《史记》、《汉书》本传都说贾谊哀伤自己做太傅不称职,常哭泣,一年后亦死。梁怀王死后,贾谊上《请封建子弟疏》,他根据梁怀王死后当时诸侯力量对比关系做了一个有利于国家统一的调整方案,被文帝采用。从这些事实,看不出贾谊有悲观、怨望的情绪。梁怀王坠马死,是偶然失足。贾谊的伤心哭泣,恐怕不仅是因为对不起文帝的重任,或是相信鹏鸟入舍之说,更是因为他的教育思想的破灭。因为他认为:“天下之命,县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蚤谕教与选左右……教得而左右正,则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保傅》)梁怀王一死,他恐怕再没有被重用的机会,远大的政治抱负,更难以实现了。

贾谊短暂的一生,却给我们留下不少作品:赋有《吊屈原赋》、《鹏鸟赋》、《旱云赋》、《麓赋》(残)、《惜誓》(或云屈原原作);疏有《陈政事疏》(或云《治安策》)、《论定制度与礼乐疏》、《论积贮疏》、《陈铸钱疏》、《上都输疏》、《谏立淮南诸子疏》、《请封建子弟疏》;政论文有《过秦论》等。今传《新书》十卷,是后人据他的疏文等整理而成的。

刘歆说:“汉朝之儒,唯贾生而已。”(《汉书·楚元王传》)刘向说:“贾谊言三代与秦治乱之意,其论甚美,通达国体,虽古之伊、管未能远过也。”鲁迅说,贾谊的作品“与晁错之《贤良对策策》、《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鲁迅《汉文学史纲要》)。这些都是对贾谊的正确评价。

二、《新书》的内容与贾谊的思想

《新书》的书名和卷数,历代著录不一。《汉书·艺文志》云《贾谊》五十八篇,未提卷数。《隋书·经籍志》云《贾子》十卷,《旧唐书·经籍志》云《贾子》九卷,《崇文总目》云《贾子》十九卷,《直斋书录解題》云《贾子新书》十卷,南宋《中兴馆阁书目》和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云《新书》十卷。孙诒让说:“《新书》者,盖刘向奏书时所题,凡未校者为故书,已校定者为新书。”(《札迻》卷七)汪中亦云:“称《新书》者,刘向校录所加。荀卿子称《荀卿新书》,见于杨倞之序,是其证也。”

关于篇数,《汉书·艺文志》提五十八篇,北宋王尧臣《崇文总目》“本七十二篇,刘向删定为五十八篇”。这可能是根据刘向《别录》(已佚)的材料,已无从详考。南宋王应麟《玉海》记载的《新书》目录,与今本《新书》相比,除《过秦论》只分上下两篇,《连语》作《昭纪·连语》,《谕诚》作《谕诚》,《退让》作《退逊》外,余则相同。明何孟春《贾太傅新书订注》和周中义《子汇》本有《审取舍》一篇,乃《汉书·贾谊传》中自“凡人之智,能见已然,不能见将然”至“人主胡不引周秦事以观之也”一段文字。孙钦善《〈过秦论〉分篇考》认为只分上下两篇(见《文史》第三辑)。

《新书》五十八篇,亡佚《问孝》、《礼容语上》两篇,今存五十六篇,分十卷。卷一至卷四(《过秦上》至《铸钱》)为“事势”类,皆为文帝陈政事。卷五至卷八(《傅职》至《道德说》)为“连语”类。卷九(《大政上》至《修政语下》)四篇不标目(《玉海》标“杂事”)。卷十(《礼容语上》至《立后义》)为“杂事”类。“连语”、“杂事”两类或为太傅时所用的教材和笔记,或释经传古义,或草创仪法,与“事势”类陈政事不同。

《新书》反映了贾谊丰富的政治、经济、教育、哲学思想,而政治思想最为突出。

贾谊的政治思想,既不同于孔子的“从周”、“好古”,也不同于商鞅的反对“法古”。贾谊在《过秦论》里说:“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

世,参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因时。”这就是他的政治主导思想。

鉴于秦朝速亡的教训,洞察现实生活的矛盾,贾谊在《新书》里构造了一个理想的治国框架:即以仁义为经,以礼节为纬,以法为辅,建立一个天地与人世万物和谐统一的国家:诸侯附亲轨道,致忠而信上;兵革不动,民长保首领;匈奴四荒,乡风慕义,乐为臣子;天下富足,资财有余,民素朴顺而乐从令;官事甚约,狱讼盗贼鲜有;天下顺治,海内之气清和咸理,万生遂茂(《数宁》)。这是他的理想王国的生动描绘。

《数宁》篇表明,这个治国框架是要“建久安之势,成长治之业”。何以为之?必须以“仁义”为根本进行治理。这种思想,是在分析总结秦王朝的兴衰盛亡的基础上得出的。他接受了陆贾“逆取”、“顺守”的主张,认为秦之速亡是由于“仁义不施”的结果。《过秦中》写道:“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而立私爱,焚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孤独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也。”不仅秦王不行仁义,二世也是如此。二世“重以无道,坏宗庙与民,更始作阿房之宫;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赏罚不当,赋敛无度。天下多事,吏不能纪;百姓困穷,而主不收恤”(《过秦中》)。并为二世和子婴作了一些治国设想,可是“三主之惑,终身不悟”,因此亡国是必然的。

孔子说:仁者爱人。施仁义的对象是广大人民。民安才能治国,所以说牧民之道“务在安之而已”(《过秦中》);也只有民安了,才能讲礼义,“安民可与为义,而危民易与为非”;可见仁义治国,必须爱民,以民为本。《新书》中的民本思想十分突出,除《过秦》上、中、下三篇外,更突出地表现在《大政》上、下两篇中。《大政上》指出:“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并且从国家的安危、存亡、兴盛、功业四个方面都取决于人民,论证了“民为国本”的道理。指

出民心的向背,民力的重要,统治者不可不察。不仅秦王朝的兴衰史证明这一点,春秋时许多国家的兴亡也证明这一点(见《春秋篇》)。民本思想,起源很早,《尚书》里就有表现。《虞书·皋陶谟》:“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已指出天之所行,皆通过民来表达,民已成为天意之代表。《周书·酒诰》:“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也是以人民为国家根本之意。孔子的政治主张,首先在爱民。樊迟问仁,子曰爱民(《论语·颜渊》)。这种爱人即为仁的思想,发展到后来,孟子直接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主义(《孟子·尽心》)。荀子把君比作舟,把民比作水,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荀子·王制》),也是民本思想的继续发展。贾谊吸取了他们的思想,但不论是在对人民力量的认识上,还是在安定人民的办法上,都比前人更为深刻,更为全面具体。他进而提出了以是否爱民作为衡量国家政治的标准,直接治理人民的是吏,那么吏治如何,可见民治如何,亦可见君治如何。《大政下》说:“有不能治民之吏,而无不可治之民。故君明而吏贤矣,吏贤而民治矣。故见其民而知其吏,见其吏而知其君矣。故君功见于选吏,吏功见于治民。”又说:“民之治乱在于吏,国之安危在于政。”并主张人民参加对吏的选举:“明上选吏焉,必使民与焉。故士民誉之,则明上察之,见归而举之;故士民苦之,则明上察之,见非而去之。故王者取吏不妄,必使民唱,然后和之。”以人民的好恶作为取吏的标准。政府官吏应“以富乐民为功,以贫苦民为罪”(《大政上》)。他劝告君主,只有把广大人民的生活安顿好,无衣食之虞,统治才能稳固。否则,“饥寒切于民之肌肤,欲其无为奸邪盗贼,不可得也”(《孽产子》)。在《忧民》、《无蓄》两篇,提出“蓄积”政策,也是从人民生活的角度,来表现他的民本思想的。

理想的国政,必须靠理想的君主来执掌。贾谊主张建立的国政,是定于一尊的皇权专制。为了使皇帝有绝对统治的能力,贾谊提出“阶级”的观念,以巩固并神化皇帝的地位。《阶级》篇里说:“天子如堂,君臣如陛,众庶如地,此其辟也。故堂之上,廉远地则堂高,近地则堂卑。

欢迎访问：电子书学习和下载网站 (<https://www.shgis.cn>)

文档名称：《新书》方向东译注.pdf

请登录 <https://shgis.cn/post/1739.html> 下载完整文档。

手机端请扫码查看：

